**韩国发展经验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2015年11月20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下属北京博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主办，国泰君安证券公司协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第三次月度例会召开。本期月度例会的主题是长期增长理论，任泽平介绍了韩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对中国的启示。

一、**韩国发展经验和危机应对**

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介绍了韩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他认为，韩国经济规模虽然远小于中国，但是在发展阶段和历程方面与中国有较多相似之处，经验值得中国学习借鉴。

**韩国和其他快速腾飞的发达经济体类似，也经历过增速换档过程。**德国曾在60年代、日本70年代、台湾80年代、韩国90年代经历增速换挡[[1]](#footnote-1)。这些经济体增速换挡的时点具有共性，一是遇到刘易斯拐点，二是房地产拐点，重化工业结束了，然后服务业、消费升级。刘易斯拐点出现以后，出口增速换挡、贸易盈余下降、投资贡献下降、消费贡献上升、城镇化进程放缓、出口产量达到峰值、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上升。经过经济转型之后，消费结构升级。韩国消费支出中食品占15%，美国占10%，日本大概占11%。中国2011年占36%，现在大约32-33%，由对比可见，中国消费升级的空间仍较大。

**韩国未能顺利处理转型期经济矛盾，导致金融危机爆发。**1961-1979年，韩国高速追赶，以出口导向战略，形成了体制。美日欧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六七十年代把重化工产业吸收过来。刘易斯拐点约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出现，房地产长周期拐点也是在八十年代出现，此后高增长时代结束，产能面临严重过剩。韩国当时没有意识到问题严重性，财阀游说政府支配银行继续给传统产业放贷，并且把控第二金融圈，借金融自由化之际借入大量外债，1996年韩国财阀资产负债率已达到80%。加之低端产业中国竞争以及高端产业日本的压力，整体经济困难和风险大大增加。不愿减速、维持刺激、货币宽松、加之金融自由化中缺乏统一规划和监管，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韩国在九十年代初期由金泳三总统领导实施政治改革，建立民主政府和文人政府。金融危机之后，由金大中总统领导实施经济改革。韩国政府首先克服外汇危机：先和债权人谈判，短债变成中长期债；再和IMF、美国和中国谈判，接受IMF提出的苛刻的救助条件，财政压缩、更加大尺度地对国外FDI进行开放，向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救助请求，并向中国总理朱镕基提出人民币不贬值的请求。然后韩国政府开始做金融部门的改革，一是整顿不良金融机构，清理不良债权；二是改革第二金融圈，开始做防火墙，强化对小股东保护，建立独立董事的制度，限制大股东对第二金融圈的控制等；三是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使得金融企业成为完全自我经营、自我承担风险的主体；四是建立统一的监管机构，发展资本市场。此外还有公共部门简政放权、劳动部门改革、文化创意产业放开等等。通过一系列彻底改革，韩国走出了危机阴影。

**二、中韩发展背景对比与讨论**

**韩国发展经验对中国有借鉴作用，但中韩两国发展背景也有较多差异。**任泽平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方晋总结了韩国与中国的主要不同点：第一，韩国遇到挫折以后由美国牵头救助，中国缺乏相应保障；第二，韩国往高端制造业升级有重要条件：美国对它的技术出口开放，对中国是封锁的；第三，韩国经济体量较小，几个产业发展就把国家带出了危机，中国实体经济需要更多产业发展；第四，韩国是市场经济体系、法治环境，大财阀即使低效率，但毕竟是私人企业，政府对资源分配干预的程度虽然比较高，但还是与中国体制不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马名杰表示，韩国创新的经验可以对中国有所启示。**韩国六七十年代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包括产业政策，都不是十分成功，财阀体制、大企业垄断也不利于创新，但是最近十多年实现非常大的创新，其中理由需要重点研究；韩国政府对新兴产业的政策中国也可以参考借鉴。方晋提出，韩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可能和九十年代政治改革营造的开放环境有关。刘世锦表示，需重视企业本身的研发升级能力。韩国政府对研发方面有没有特殊支持政策，企业自身对形势有所判断，在重化工业之后马上可以寻找新的空间。中国国有企业缺少创新，政府规划成功概率低，成本高，不如放手由企业开拓进取。

对于韩国的大企业路径和台湾的小企业路径的对比，任泽平认为，韩国做自主品牌，占据资源之后可以进行内部创新，具有谈判话语权；台湾走代工之路，利润很低，一直被挤压，没有能力进行创新，又没法谈判，以至于台湾发展不如韩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许伟表示，台湾是中小企业，在产业链上只占据一段，这是台湾理性的选择，台湾的代工触角已经深入到研发的领域；韩国大企业可以覆盖完全产业链，但是风险也很大，如果颠覆，整个产业链就颠覆；两种模式难说孰优孰劣。

**三、中国经济转型和长期增长展望**

**对于中国的发展前景，刘世锦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不能简单以趋同法论之。**​传统趋同法把各国增长过程简单化，一般只考虑几个变量，如劳动力、资本增长、中美差距、趋同时间等。经济研究需要的是一个动态演化过程，不同阶段各种因素搭配组合都不一样，一个经济体起飞之后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如何降落，这些问题目前尚没有好的研究架构。

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斌提出：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工业化规模上的拐点已经过去了，对比各国发展经验，这个阶段经济增长速度往往都会下降。转型以后是不是符合相应的经济增长速度，目前尚缺少研究。增长涉及服务业的发展潜力、制造业的升级。从美国的经验看，很多非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服务业在下降，只有那些能雇佣得起更多的人力资本，即劳动密集型的行业才会增长。制造业升级也存在瓶颈。目前政府在医疗、教育等领域管制过严，制约了社会资本的积累和经济转型。

**博智宏观研判论坛是聚焦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研究型论坛，旨在跟踪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判断短期经济形势，预估中长期经济态势，对中国经济的重大战略性问题进行研判。通过连通政策、市场与学界的共同关切，为政府和市场机构做出决策参考**。

**博智宏观论坛以月度研判例会为主，同时还将结合对重大问题的长期跟踪和深入调研，以半年度视频会、年度研讨会等形式组织研讨。研讨成果和专题研究，以月度简报、季度专题报告和年度综合报告等形式，定期送论坛与会专家和相关单位参阅。**

**北京博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下属研究单位，遵循基金会“支持政策研究、促进科学决策、服务中国发展”的宗旨，在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领域开展研究工作，组织社会实践，服务首都和全国发展。**

**博智宏观论坛**

**主办：北京博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

**协办：国泰君安证券有限公司研究所**

**召集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

**负责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北京博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理事长卢迈**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北京博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方晋**

**协调人：许伟、俞建拖、郝景芳**

**项目组成员：陈浩、陈诚、张荆、张纯**

1. 当时德国7800万人，日本1.3亿人，台湾2300万人，韩国4800万人。 [↑](#footnote-ref-1)